

◀ (上接 8 版)

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其中各学科的词都请有关学科的专家审过，因而出错较少。

《辞海》是大型综合性辞典，根据学科发展和读者类型来编纂、修订词条，分科主编基本上都是各个学科的权威，具有鲜明的原创色彩和时代属性，所以取得了读者的信任。《辞海》能不能被复制？很难。1995 年，曾有人想打造一本比《辞海》大得多的《辞天》，号称“《辞海》之外有《辞天》”。但当这位投资者去上海辞书出版社参观，听了巢峰、徐庆凯等先生的介绍、看到了辞海编辑部的工作情况后十分感慨，说：“我在这里看到了一片净土。”此事就此告吹。

《辞海》是一部融入了几千位学者心血、历经多次修订的宏大文化工程，是我国唯一的大型综合性辞典。她能历经八十多年的风风雨雨，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现在又在此基础上编纂了规模更大的《大辞海》，并正在进行数字化的努力。这两项宏伟的文化工程，以及辞海人在实践中创造的“辞海精神”，必将在我国文化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，旧的要淘汰，新的要创造，通过增删和修改，使得新一版的《辞海》越来越科学和准确

李世愉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）：我和《辞海》的感情很深，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在北大读完研究生毕业后，我到了社科院历史所，被分在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编纂处，前期从事一些组织工作。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历史专科辞



李世愉，负责《辞海》(2019 年版)古代史部分的修订。

典，由社科院主持，国内一流的历史学家都参与进来。比如历史地理的谭其骧、史学史的吴泽、宋史的程应镠，还有北京的李学勤、天津的郑天挺，等等，现在好多人已经不在。

当时刚打倒“四人帮”，大家的学习和工作热情空前高涨，但苦于没有经验，不知道怎么编辞书。很多学者是某个领域的权威，但让他们写词条就犯难了。上海辞书社听说了这个选题，很快派人来北京商谈出版事宜，帮助一起完善“大辞典”的体例，并结合《辞海》的编纂方法和工作经验开展培训。从最简单的讲起：一个词条的基本要素有哪些，怎么写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；词条的体例要求统一，不似写文章可以有每个人不同的风格……培训完以后，我们就学着写，然后给辞书社的人看，提意见，回去再修改。时间一长，慢慢就琢磨出来了。

《辞海》(1999 年版)着手编纂的那段时间，我正好在上海，做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的修订，就住在辞书社里头。虽然没有作为正式作者参与，但《辞海》那边碰到什么古代史方面的难题，也会过来问问。大概是 2004 年的时候，辞书社邀请我承担“2009 年版”的编纂工作，主要是负责古代史部分的典章制度，包括官制、兵制、教育、科举、年号等，古代史的另外两个分科主编是上海的。于是我找了 9 个人，每个人研究不同的断代，并且他们都参加过“大辞典”的工作，积累了一些辞书经验。当然，除了基本的要素(哪年出生、哪里人等)，两部辞书的写法和要求并不一样。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属于专科辞典，释文更长，要把人物经历或者事件背景交代得很清楚。

今年年初我去了趟上海，把“2019 年版”的稿子交了。一共是六七百页，前前后后看了四五个。相比这次，“2009 年版”的工作量更大，因为旧版的《辞海》在选目方面有些缺



刘君德，负责《辞海》(2019 年版)中国地理部分的修订。

憾——收了一部分很偏的书目、人名和地名，而一些人们比较熟悉的内容却没有。我听说，原来的古代史部分选词主要依据翦伯赞的《中国史纲要》，那本书当年是高校指定的历史教材，很重要，但《辞海》以此为主，显然不够。因此我们在典章制度部分花了很多工夫，补充了大量内容，约占旧版的四分之一左右。有了“2009 年版”的“大刀阔斧”，这一次我们的工作就轻松多了。

《辞海》的每一次修订都是与时俱进。有一段时期的研究重视阶级斗争、农民起义，所以在选目上就有偏重，与农民起义有关的人物选得比较多。一版版改下来，史学家的个人情感逐渐淡了，作为辞书的性质和要求而言，也就更客观了。我举个例子，国家有个“清史工程”，原来人物传的对象从皇帝到大臣，从文学家到艺术家。后来通过采风发现了一个很小的官，叫王鼎铭，山东人，在湖南新田做知县，为官清正，多次变卖家产为老百姓办实事，还提出了“天理、国法、人情”的施政理念。面对瑶民起义，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，“尔果与我新田为仇，当杀我，勿伤我百姓”，最后英勇就义。彼时今日，新田当地一直在纪念王鼎铭，所以修清史时将其收入《循吏传》。我跟辞书社说，《辞海》(2019 年版)应该为这个历史人物加一个词条。

此外我还建议过，称谓类的词条要适当增加，为社会服务。现在中国人对于称谓不太熟悉，经常用错。我给学生上课，问他们什么是“外子”，什么是“姑舅”，都不知道。“外子”是旧时妻子用来称呼丈夫，“姑舅”指公婆，单独用“姑”就是婆婆的意思。过去讲百工称谓，科场称谓，官场称谓，称谓制度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。我还记得 20 多年前去广西，那会儿人们喜欢管女服务员叫“小姐”，喊服务员的话就没人理你；2002 年，我去考察清代边界，在中越

边境的饭馆吃饭，这时的称谓又从“小姐”变回了服务员。

在综合性的工具书当中，《辞海》无疑是最受欢迎的，使用频率也最高，一般的单位都会摆上一本。辞书社提出“十年一修”的理念非常好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，旧的要淘汰，新的要创造，通过增删和修改，使得新一版的《辞海》越来越科学和准确。有些研究结论放在过去也许是对的，但过了 10 年就不一定成立，或者表述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。历史不如现实活跃，不过历史研究也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掌握新的材料，形成新的观点。比如我搞的土司制度，从“2009 年版”到“2019 年版”，改动的内容就比较多，因为 2015 年土司遗址申遗，影响非常大。

编辞书不容易。做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的时候，国家给钱，老先生们学问好，也愿意奉献，很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。比如杨志玖先生，一条条看，一条条查，几十万字的稿子要看一年两年。假设现在重做一本，我觉得不可能完成。为什么？一来，从先秦到清代，历史领域的研究跨度之大，需要组织全国的学术力量。不管你是北大、复旦还是社科院，都没办法凭借一己之力担当此任。二来，学界的浮躁之风盛行，好多学者都奔着各种荣誉去了，还有多少人肯牺牲自己，不计名利地编辞书？这次修订《辞海》(2019 年版)，我带着两个年轻学者一起做。50 多岁，一个研究隋唐、一个研究魏晋。我让他们坚持做下去，虽说吃苦，也不算成果，但既然是为了社会文化教育事业，总得有人做。

上次碰到辞书社前社长李伟国，他说《辞海》要数字化，做网络版，树立权威。现在网上的信息真真假假，谁信呢？哪怕抄《辞海》，也可能是抄错的。不管“2029 年版”是一种什么样的出版形态，能够保持“十年一修”的传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《辞海》能取得这样成绩，在于拥有一批

热心辞书事业的人，他们深谙辞书理论又有丰富的编纂经验。但愿现在这批辞海人能在出版界和学界树立一个好的榜样，把老一辈的“辞海精神”继承发扬，做好《辞海》，这对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而言，是非常大的贡献。

我今年 80 岁了，不知道下一版《辞海》的修订还能不能参加？如果我退了，后面谁来接替我的工作？

刘君德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）：我在华师大地理系读书的时候，系里有胡焕庸、李春芬、陈吉余等一大批名师，他们在中国地理教育的地位举足轻重，对我后来的治学和教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。地理学科涵盖面广，要学的东西很多，从地质、水文、气象到生物、植物、动物，从中国地理到世界地理，从自然地理到人文经济地理。

1984 年，我开始关注行政区划的研究，这个领域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什么进展。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，行政区划是关于国家政治、行政体制与地域空间相互耦合的重要文化成果之一。我当时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安徽某地的行政区划出了问题。一个星期左右，华师大就收到了安徽省委转来的公函，他们的省长和书记均批示要解决。这件事启发了我，中央层面如此重视，行政区划的研究大有可为。

在成为《辞海》分科主编前，我其实已经积累了一些辞书编纂的工作经验。上世纪 80 年代，李春芬教授主编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》之《上海市》，这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工程。我那时是地理系的副主任，李教授年纪大了，想要培养年轻人，就带着我一起做，还让我担任这本书的副主编。后来就是《辞海》(1989 年版)，中国地理部分由褚绍唐教授负责编写，他也是我的老师，中国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功底都很深厚。由于行政事务较多，我只参与了一部分的词条整理。

至于什么时候收到《辞海》编委会的聘书，说实话，我记不清了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去认真对待《辞海》的编纂和修订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有些学者不愿意编工具书，枯燥、繁琐，稿费也少，所